

结构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社会转型 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当代转换

刘中起

(上海行政学院 城市社会研究所,上海 200233)

[摘要]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实践中,作为马克思解开“历史之谜”、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社会结构理论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与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前六十年实践历程显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轨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阶段。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当代的华丽转换。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采用制度、政策创新等不同的改革策略,促进社会结构优化,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均衡,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不断转换必须面临的时代议题。

[关键词] 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0)02-0047-05 [收稿日期] 2009-09-14

[作者简介] 刘中起,男,上海人,上海行政学院城市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

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深深撞击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要素,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正在缓慢但又不可逆转地向现代社会转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实践中,作为马克思解开“历史之谜”、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社会结构理论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与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前六十年实践历程显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轨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阶段。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当代的华丽转换。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采用制度、政策创新等不同的改革策略,促进社会结构优化,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均衡,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不断转换必须面临的时代议题。

—

在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孔德、涂尔干、齐美尔直至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在努力把社会结构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事实而非个人主体主观抽象的结果来看待,主要探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社会结构理论也是马克思解开

“历史之谜”、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的观点表述了社会结构理论,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社会总的结构发表了精辟见解。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充分展开了社会结构理论,通过对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矛盾运动的剖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纵向发展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并从生产力、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视角,总结出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

从某种角度来说,社会转型主要体现于社会结构转型的程度上。社会结构转型强调一种模式体系的嵌入以引导各种关系体系的转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新的模式体系下进行重组,与社会组织方式以及制度设置实现同步过渡。社会转型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变化,马克思曾针对欧洲的社会转型特别指出:“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财富。而且这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是革命性的。”^[1]现代的生产方式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实践活动都纳入了“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之中,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次变革使得经济因素上升为影响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甚至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力量。这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中那种依靠政治力量统摄经济和文化,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结构状态,使得它们能各自独

立地发挥其职能和作用。^[2]

就我国社会转型的取向而论,现代型的社会在结构体系上是完全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这一方面为转型提供了一种必要,而另一方面对转型的强度和向度有较高要求。强度上要实现一种继承的过渡,而非中断或者是变异的转变;向度上要实现个体之间、社会共同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关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以构建起现代性动力机制的实现框架。^[3]中国社会经历的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为经纬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远可溯源至近代的“洋务运动”及至新中国的成立,近则诉诸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及相伴而来的改革开放则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趋向多元,利益格局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结构由同质转向异质,堪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最为深刻广泛的一次格局变动。^[4]如果从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宏观角度考察中国,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起初估价的体制变革的狭隘领域,它已汇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道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潮流之中,是一场全面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实践中,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亦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与转换。建国之初,毛泽东通过对中国所处时代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分析,指明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方向和步骤,正确分析和处理了中国建设中实际存在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造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出发,提出了改革旧体制的任务,在社会结构、生产力结构、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结构等方面,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做出了重大创新。世纪之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落实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当中,落实到了党的建设当中。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具体和深化,既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不断更新的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要求,又切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有助于解决当前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和科学发展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而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则是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中国当代的华丽转换。

二

在1873年之前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结构分析是以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英国作为典型进行的,在揭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社会结构的同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阐明了一般社会结构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指明了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现代化的一般社会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组成的整体——社会系统。社会的有机体活性特征乃是根源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由此,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联结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赋予整个社会以有机体活性。所谓的社会发展问题,其实就是东西方之间、南北之间的一种社会结构上的差异问题,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结构跃迁的过程。可见,“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題,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这一点,构成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6]

马克思通过“人体解剖”的方式揭示出社会结构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和层次性三大特征。在185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对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各构成要素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7]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将社会的基本结构看成一个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依据马克思,在各个要素中,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层次是最为根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从这个角度讲,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就是随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而不断变革和发展的。由于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因此,生产方式的变化总是发端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9]

1873年以后,马克思借助于文化人类学和东方学等实证科学的成果,运用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结构理论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公社区分开来,将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对照起来进行研究,突出强调了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展示出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可能的发展道路。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马克思则是基于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对立统一中看待社会发展与转型问题,将社

会发展成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要求人们从社会结构的建构、重组和解构的冲突与融合中来推进社会转型。因而,鉴于社会结构的基本特质,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对社会要素实现其资源性转化的影响表现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才可能拥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令各种社会要素充分扩展——从而对社会产生规模性整体性影响。而实现社会要素充分转化为社会资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人们能够自由地交换他们的活动产品,这种生产和交换活动并且能够在价值上被确立。

马克思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对自身以外的世界的建构是和它的活动相联系的,取决于活动的深度与广度。而活动要想积累和扩大,必须在外在存在中被凝固,也就是说,人的活动只有在存在中被记录和吸收,才有可能扩大规模和范围,从而才能使活动普遍化。而最具扩张性的活动就是商品生产。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那里,生产商品的活动是人类活动历史化的前提。市场经济既是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重要机制,同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国家权力绝对化和无限扩张,掌握全部社会资源。资源配置主要由国家控制,不可能有充分发育的个人、社会与市场。虽然在局部地区商品经济有相当高的发展,但它毕竟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资源配置机制。而对社会来说,当人们只有通过权力占有社会资源才能够获得他所想要的利益时,在价值取向上必然指向权力或权力关系,这进一步抑制了个体、社会与市场的发育。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人们的活动会制约着人们的现实关系,反过来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同样制约着人们的活动。在社会关系还十分狭小的时候,人们的活动只能局限于一个“孤立的点上”。^[10]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社会结构根源。

从社会结构关系的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以家庭关系建构社会关系,使一切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化。^[11]这实际是私人化关系在公共空间里的延伸。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旧中国社会政治之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人们“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之间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12]由此一来,使关系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特性。彼此关系受着伦理情感和个人的具体属性如身份、地位、学识、学历乃至衣着相貌和谈吐等等的影 响,使关系有亲疏好坏之分,而无法形成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化关系形态。同时,社会关系二人化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组织主体性“消解”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之政治结构的内在机制和基础,使中国社会扁平化,任何权利主体和社会力量都难以产生,全部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中国传统国家存在着权力和能力的悖论。一方面君主(代表国家)掌握了绝大

部分社会资源,乃至对个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发育个体、社会和市场皆不可能。社会资源要素缺乏合理的配置机制也表现得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家缺乏来自社会团体的有效支撑,以致社会调控能力相对不足。在社会矛盾发展尖锐时,往往容易陷于失序状态。这是中国传统国家长期以来在社会治理方面常处于管死放乱两头不着力的状态,始终走不出治乱周期性循环困境的根源。其实这也是中国近现代转型困境的根源。^[13]

三

在把资本主义作为典型形态进行解剖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的规律,将社会的变革与转型看成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进而要求人们从社会结构的建构、重组和解构的冲突与融合中来推进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彻底宣告了社会历史领域唯心主义的破产。^[14]由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认为,资源关系生存。由于社会资源占有不平等的代价承受者是处于社会低层的阶级、阶层,他们最有改造社会结构的冲动,社会结构进化产生于处于社会低层的人们的需要。这些阶级和阶层对于改造社会结构的愿望,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的意志和行为最富有创造性,它们社会地位的改变,是社会结构进化的标志。恩格斯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表达代表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他指出,“在英国,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愈低,愈没有教养(就一般意义来说),它就愈有远大的前途。”“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15]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50 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以高度集中的政治构架为依托,建立起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由于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单位之间不平等的行政等级关系,以及在单位制度中人力资源的单向流动性,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僵化与人事变动的单向性。^[16]可以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是计划体制。社会资源极度匮乏,而且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再分配。在这种背景下,80 年代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仅推动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还因为发端于边缘地带的改革模式和“做大蛋糕”的发展模式,更带来了资源扩散的社会效应,使中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所谓“共同富裕”的黄金时代。就这样,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而且还造就了阶层分化的历史契机和演变动因。转型时期

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以农民的分化为起点,广泛覆盖并迅速渗透到原有的或新生的社会各阶层中去。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从扩散到积聚的趋势性转变,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阶层继续分化的背景、状况和趋势。^[17]

资源重聚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严重失衡。与此同时,人们对资源和财富占有上的差别,开始固化为阶层结构。阶层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感增强,阶层间的流动逐步减少。关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孙立平提出结构型断裂。从某种角度说,断裂是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免的现象,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很明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存在着延继,两者都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18]断裂与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相关,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型社会结构和组织模式在此前的历史中未形成内发的基础,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出现必然性断裂。我国在传统农业大国和全球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启动转型,尽管采取了非自然的和局部变迁的路径,避免了突然的变异现象,但在结构转换中仍出现一些断裂。可以说,其一方面是由于改革进程中区域性现代化转型引起的差异性变迁导致了社会客体体系结构的疏离而致。^[19]区域性现代化转型主要体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步骤上,在实现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另一部分人和地区处于疏离状态,最明显地表现在城乡两大社会客体结构的差异上。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受一种外在力量推动而形成的,忽视了社会客体关系体系的连续性和阶层力量的可比性,从而在个人主体再嵌入社会客体的过程结构上造成一种疏离,未富的人远远被抛弃在制度之外,很难融入新的社会设置当中。另一方面,西方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内生的渐进发展过程,市场经济因素在转型前的自然经济中萌芽并逐渐壮大,从旧制度的内部引发长期的渐进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历史传承性的破坏和冲击与前者相比要轻缓得多、微弱得多。相反,这种矛盾和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则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是突发性的。因此,极易引起历史传承性的断裂。^[20]

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主张资源的配置和对资源的占有是阶层结构形成的基础,认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既是阶层分化的前提和条件,也是阶层分化的实质和表征。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源占有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影响着社会结构的进化,最终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马克思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适度的利益差距是社

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转型时期过度分化、严重失衡的利益格局已经成为社会冲突频发的总根源。据统计,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群体性事件大幅上升,年均增长17%。群体性事件的规模逐年扩大,100人以上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占总数的比例,1994年为13.6%,2000年和2001年分别升至14.5%和15.6%。^[21]群体性事件涉及的多是群众的切身利益,如工资、社保、福利问题;企业改制改组兼并破产造成待遇下降问题;征地搬迁问题。新型城乡无产者的出现,以及它们与资产者的对立隐藏着社会冲突与分裂的隐患,并且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着影响,一旦发生激烈的对抗行为,则会导致改革成果的丧失。科技、教育、文化工作者资源所有权的缺失问题,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他们的社会主体性难于确立,同时影响到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劳动者阶层缺乏对国家事务的监督,使劳动者阶层处于改革的旁观者、甚至成为改革的被动承受者及代价负者,这使它们的改革热情和信心逐渐减退,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深化十分不利。^[22]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已经走过收入分化时期,进入利益分化阶段,在现阶段,能够支配和左右改革进程甚至方向的,更多的已经不是改革初期对过去发展道路的反思和对旧体制弊端的认识,而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结构。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利益博弈”阶段,利益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前六十年实践历程显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轨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阶段。而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可以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当代的华丽转换。应该看到,社会结构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和谐有序的一面。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他既看到了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矛盾和冲突,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当代,和平与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对社会结构和谐有序发展的关注就显得更为必要。为此,就必须研究社会结构内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序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社会结构有序发展的内在根据在于,社会结构本身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正是这种自我调节功能使得社会结构和谐有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社会不存在矛盾和冲突。虽然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利益结构和阶层结构严重失衡等社会矛盾和冲突有着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特点,但矛盾和冲突存在的客观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实际上,在社会结构的运行过程中,绝对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存在的,就像不存在绝对的和谐和有序一样。社会结构的和谐有序建立在社会结构的矛盾冲突的基础上,而社会结

构的矛盾冲突的最终目的无疑是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的新的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23]

马克思认为,任何机体的各个被划分的方面都处于由机体的本性所决定的必然联系之中。从形态上看,社会结构是一种以人为载体和纽带,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纵横交织的网络型社会运行体系。在这种网状结构中,各个子结构作为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使得每个社会要素、每种社会生活都紧密联结为一个高度相关的系统整体。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把握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出发,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描绘和展示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紧密联系、互相协调,才能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有序和谐的状态。^[24]可以说,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战略从最初的“二位一体”到后来的“三位一体”再到现在的“四位一体”,显现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转换过程。

马克思揭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瓦解了,劳动者沦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使工人只能获得工资即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工人所创造的超过工资部分的新价值成为被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从而产生并加速机器排斥工人的过程,形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这必然造成财富在一极集中,贫困在另一极集中。马克思把这种“两极对立”称为“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然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趋下降,同时中产阶级的出现则更是改变了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社会阶级结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描绘出“单一结构”社会的基本特征:它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并建立起单一的生产资料全社会所有制:全体居民以自由人的身份组成联合体,共同使用和管理全部生产资料;按照计划组织社会生产;按照劳动数量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表明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两种公有制、两个劳动阶级”并存的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结构。在收入分配格局上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结构。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农民阶级这两大劳动阶级以外,还出现了在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

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将会继续发生新的变化。^[25]实际上,在西方,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较早就提到了中间阶层等新阶层的问题。他从比较分析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着手,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间阶层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26]同样,在东方国家的社会转型中,中间阶层占据社会主体,也是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因此,要培育和壮大中间阶层,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城乡的互动,建立良性的竞争机制和开放的社会流动结构,实现社会成员从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27]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逐渐打破,通过国家权力固化的人的社会身份也发生了改变。社会的流动性得到加强,原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及分配方式也日趋多元化。同时,经济地位的差异也与社会地位的差异趋于一致。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也促进了阶层分化重组。当前,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28]因此,基于结构主义视角,推进社会结构全面优化将成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新的重要风向标。而衡量社会结构优化的标准则是,处于社会低层的劳动者能不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能改变自身的命运,提升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层次。由此,可以考虑从改革运行方式和改革模式上做出新的探索。^[29]在改革运行方式上,可以考虑将自上而下的改革运行方式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运行方式结合起来。一方面,改革到了目前的阶段,已产生出既得利益群体,改革深化造成的利益调整势必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从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出发,它们会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抵制改革或是将改革政策导向引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因此需要从社会低层为改革提供动力。另一方面改革除了要促使经济发展之外,也是一个社会结构不断进化的过程,即是一个培育公民的自主性,让更多的人有发展自我的空间,构建公民社会的过程,由此可以在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方面进行推动;在改革模式上,可以考虑将渐进式改革模式与突变式改革模式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交替作用的过程,渐进式改革解决量变的问题,突变式改革解决质变的问题。如目前的科技、教育、文化等行政管理体制已受到社会的质疑与抨击,将其喻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是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最大的障碍,像这样的问题就只有采取体制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又如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不进行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改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恩格斯曾指出,“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

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采用制度、政策创新等不同的改革策略,促进社会结构优化,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均衡,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不断转换必须面临的时代议题。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53.
- [2][20]李钢.社会转型刍议[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 [3][19]漆彦忠.弥合: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内生规则[J].甘肃社会科学,2006(2).
- [4]陈雯,何雨.秩序·变迁·和谐:社会学透视下的改革开放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J].改革与开放,2008(7).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585.
- [6]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49.
- [7][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32,32-33.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0.
- [11][1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81,84-85.

- [13]赖志凌,纪真.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实践[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2).
- [14]全燕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J].社会主义研究,2008(6).
- [15]李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不适用了吗[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
- [16]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61—65.
- [17]王荣红.论转型时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总趋向及其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8(10).
- [1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4.
- [21]何卓文.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的利益关系矛盾[J].科学社会主义,2005(2).
- [22][29]李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不适用了吗[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
- [23]杨亮才,杨鹏亮.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及其现代转换[J].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 [24]全燕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J].社会主义研究,2008(6).
- [25]崔战利.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4).
- [2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205—210.
- [27]郭威.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回应型法治秩序[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
- [2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